



P1

● 期 五 〇 一 第 ●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三月一日出版

# 讀書通訊

半月刊  
丁巳年

本刊由中華書局發行，地址：北京前門外大街

## 目 錄

學術  
論著

中西進步觀念之比較……………丁則良

中國經濟衰微的精神因素(講座)

傅樂夫

藝術教育的本意……………

豐子愷

談 藝  
人海滄桑(上)……………

朱 俠

為學與做人(生活指導)……………

朱經農

學 人  
小 傳

愛因斯坦……………朱荔萍

評朱著經濟學綱要(圖書評論)……………

夏炎德

未來的武器(張文知)

偶然的發明(振之)

編 輯 兼 發 行

### 中 國 化 學 社 務 局 書 會

(重慶磁器口三十九號)

# 中西進步觀念之比較

丁則良

中國文化，中國思想之中，有沒有進步的觀念？如果有，何以不從近代西洋的進步觀念那樣完善，那樣發達？何以沒有像近代西洋的進步觀念，發揮那極大的作用？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加以檢討的問題。

在未開始討論這些問題之前，我們先要問所謂進步的觀念是什麼？它的涵義如何？我個人認為進步的觀念中，含有兩個基本的觀念：

第一、在歷史的延續中，在某些價值標準之下，看出有所謂今勝于古的趨勢。

第二、這個今勝于古的趨勢，是人用自已的力量創造出來的，而不是由外在的意志來決定的。

普通人提到進步觀念，常常想到第一點，而忽略第二點。其實在整個的進步觀念之中，第二點的重要是決不應加以忽視的。如果以現在為分水嶺，第一點是對由過去到現在的觀察，而第二點則是出現在對將來以至于永遠的展望。有了第二點，而後進步觀念纔具有其最基本的精神。從近代西洋的歷史看來，他們的思想家除去認為人類的制度生活，文化創新確有其客觀的進步之外，却同時提出人的尊嚴，認為這些客觀的進步是人用自已的意志與智慧創造出來的。這種從培根，笛卡兒，康多塞，孔德以至于十九世紀各大家的思想的演變，我這裏無暇多說，我想近代西洋的進步觀念就是中國人所謂人定勝天的具體表現，這大概是大家都可承認的。

俄國社會學大家素羅金在其一九三七年出版的鉅著「社會文化動態學」一書中，認為各個文化的思想的發展，有其一定的法則，在某一時代之中，就會有某一種或某幾種相屬的思想。思想的發展本來不易捉摸，如果呆板拘泥于若干形式，若干法則，不免有刻舟求劍之虞。但如就大體上觀察，思想雖是時代的產物。即以進步的觀念為例，進步的觀念大概是各個文化由封建時代的束縛解放出來後，對於已往歷史的全體得一通盤的認識，對於當前的文化創造雖有一個理想而樂觀的憧憬因而發生出來的一種展望。我們試取中國歷史作一觀察，便可看出中國文化的面貌雖與西洋大異，但在春秋戰國思想解放的大潮流之中，確也有過與近代西洋類似的進步觀念之出現。

與這種觀念最接近的是戰國時代的法家。商君書更法篇裏說有一篇在秦孝公主持之下新舊兩派思想的極激烈的辯論。主張守舊的有甘龍，杜驥等人，主張變法的只有商鞅一員大將。其論爭之緊張，思想之針鋒相對，都是舊籍中所不易遇見的。商君書雖非商鞅本人所作，但這場辯論却未必純為後人杜撰，如果這場辯論確是一件真實的歷史事實，那問題可與法國在十七世紀路易十四治下的極盛時代中演發生的一古人令人欽佩的論戰，前後媲美。商鞅的態度，他自己表示得很清楚，他說：

「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他又說：「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教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械，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唐虞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古者未必是也。」

這兩段話，充分表現出商鞅的信心。如果用前兩段所提的兩大標準來衡量，他的思想中，確有積極進步的觀念。他一面認為制度生活（禮與法）隨時代而

改變，而進步，同時更主張「知者」，「賢者」來「變法」。商君嘗開懸賞，還有一段說明他或他這一派人對於過去歷史的認識，簡言之，就是「上世親親，中世上賢，下世貴貴」，所以以上賢之世，不應親親，在貴貴之世，不應上賢。這和韓非子五蠹篇中所說：「桀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為殷禹笑，決瀆於殷周之世，為湯武笑，美堯舜湯武之道，於當今之世，為新聖笑。」是同樣的道理。

以上都是在肯定說中國思想中也有所謂進步的觀念。現在我們要來分析一下何以這種進步觀念，未能普遍為中國人所接受，因而未能發揮重大的影響？對於這個問題，我想應從中西思想發展的大勢上尋求解答。我認為近代西洋在文藝復興以後的政治思想，可以分為兩階段，第一段是法治，以馬奇維里。鮑丹，霍布士為代表。他們的主張，用最簡單的話來說，就是君主制法，臣民守法。第二段是民治，以洛克，孟德斯鳩，盧梭以及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者為代表，他們以民約論為橋樑，是第一段法治的思想接受過渡來，但一變而為人民立法，君主守法。因此，民治的思想與法治的思想相融合，而成近代史上光輝燦爛的民主憲政。大概說來，法治主性惡，重現實，談手段，民治主性善，重久遠，談理想。這兩種思想融合，西洋的政治思想乃有一個完整的面目，達到一個比較完美的境地。中國先秦的政治思想，是儒家先於法家，民治的思想與法治的思想，不相結合，而相排斥。商君嘗中所謂上賢與貴貴兩者之不相容，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此外，法家思想中批評以人為本的王道理想的地方，還有很多，無須加以詳贅。結果中國的政治理想，或為有理想無辦法，追求永恆，不問實際的王道理想，或為圖私利，無理想，只問現實，不求展望的君主專制。民治與法治始終成爲不相關聯的兩端。

我們如將前述的進步觀念的兩大標準，應用於中西思想發展大勢之上，我們便可看出在近代西洋，最能開揚進步觀念的是洛克以後的民主主義者，而在中國先秦，則落在法家的身上。西洋的民主主義者，自由主義者融合民治法治兩派之長，對現實之「今」，可以看出其優於「古」的緣故，對於將來，也有一個無限的憧憬，光明的展望。所以進步的觀念成爲思想的主流之一，歷時既久，陣容亦盛。中國先秦的儒法兩家，雖有法出于儒的說法，却始終形成對壘之勢。儒法兩家思想，本身各有矛盾，法家以今非古，但有進步觀念的樣子，但法家對於人根本看得很低。性惡的說法，制約的鼓吹都蘊藏一種悲觀的精神。這種悲觀的精神與進步的觀念是不調和的。所以法家的進步觀念只著重目前的變法，而沒有一個永恆的展望。

儒家的態度到這裏便成爲一個極重要的問題。普通人會覺得儒家是守舊，復古的。我個人認爲這只是一面的看法，儒家所守恢復的只是他們最崇拜的周制，用新名詞來說，他們要便封建制度，封建社會永垂不朽。所以他們一而復古，一而創有一個久遠的「止於至善」的展望。我們檢討儒家的思想，除去漢代今文派受陰陽家的影響，有些三統三世的說法之外，先秦的儒家可說並無信仰進步的具體痕跡。他們對於人總不失望，但他們並沒有令勝於古的看法。所以，法家的進步觀念，太重實際，太重目前，不能有很大的開展，儒家的精神則對於周制的恢復與空想，久遠的將來之間。儒法兩家思想之不相結合，實是中國文化，中國思想中極可玩味的一個問題了。

## 英出版「航空時代」地圖

泰晤士報航空記者稱：英海外航空公司出版一種新世界地圖，意在適合未來航空時代之飛行長距離不停之航機，正在設計中，是以必須有新地圖，讀者務請預知英後所經過之航程。英海外航空公司出版「航空時代」地圖之目的，為鼓勵運輸兒童一種地理之新觀念。

# 中國經濟衰微的精神因素

(中)

傅築夫

## (四)

近代資本主義另一個精神的指導原則，是經濟的合理主義。所謂合理主義，不僅在經濟生活中要使經濟行為切合於遠大的計畫，要正確的選擇手段以切合目的，要有正確的數字計算等，並且要在其他的生活領域中亦都合理化，如合理的國家（包括合理的行政機構，合理的法律等），合理的處世精神，合理的倫理等。中國在這一切方面，也是走了一個反對的方向；換言之，即支配中國各種文化領域的，是傳統主義，而不是合理主義。在這種傳統主義之中，實包含了各種復古的，閉關的，排外的，及特種的種種不合理的成分在內。

二千年來支配中國人思想的，大部分是保守的復古主義，因為中國人所憧憬的，不是未來的烏托邦，而是過去的黃金時代，所以儒家立說，無不託之於古，而儒學之徒，尤言必稱堯舜。淮南子曾說：「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聖而後入說，亂世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著於論而食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於此可見復古思想中之深。主要復古最力的莫過於儒家，孔子本人是「信而好古」，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禮記便是古制，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思古之制，舍此而為非者，亦鮮乎」。而儒家所謂王者之制，亦便是使人民的衣食住行婚喪禮俗等日常生活，完全合乎古制，禮記說：「王者之制，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教，妻妾械用皆有等威。禮則凡非禮者舉廢，色則凡非禮者舉息，械用則凡非禮者舉毀，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又說：「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郡國之民，安習其風」，這都是使人類的一切行為自治國安邦以至飲食起居，均須合於古制，凡與古制不合的，都在排斥反對之列。故自古以來，任何一種改革運動，不論是軍國大政抑是服飾小節總是要遭這一股

人的強烈反對，例如趙武靈王變胡服騎射時，舉朝反對，辯論沸騰，都認為「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商鞅變法，亦是舉朝反對，反對的理由是：「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是「法古無過，循禮無邪」。王安石新法之不成，顯然是失敗於保守派的破壞和阻撓。這種精神在二千年的中國社會中，實是根深蒂固，始終支配着一般人的思想和行為，「貴因循，重保守」，成了國民生活的一個基本信條，直到近代，依然是社會改革的一個最大障礙。例如清季變法維新，推行新政時，其所遭遇的反對，較之當年趙武靈王及商鞅所遭遇者實有過之無不及，尤其是修鐵路，設電報，開學堂等所謂洋務，更是議論紛紛，羣情憤激，屢倡屢阻，歷久不決。所以這種保守的復古主義，實是社會改革的一個最大敵人。

總之，中國在過去二千年中，不僅經濟活動是因襲傳統的技術與方式，而不知改革，即其他精神的及物質的活動領域，亦無不如此。有時這種保守精神發達到極端，即變為一種盲目的迷信，例如說苑中有這樣的一段故事：齊有五丈夫俱負薪而入井灌井，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為教之曰：「為德其後，輕其前，命曰樞，終日灌井，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嘗曰：『有履智之巧，必有機智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為也。子其往矣，我一心說之，不知改已。」

用現在的眼光來看，這種思想和行動真可謂迂腐已極，然而這種癡狀可笑的故事，正代表中國的傳統精神，所以這類故事在古籍中可以找到很多，例如齊魯杜預傳即載稱：「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懸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為為戲所都，屢爭費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這是說凡是古人作過的，我們便應當永遠遵照着古人的成規，奉行不替，不應當有所改作；古人沒有作過的，我們便不應當有所創立。這種態度並不是一兩個人所發的，而實是一般人的生活實踐，班固西都賦說得最明白：「於斯之時，都鄙

種室，邑邑相視，國難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老氏，農服先  
嚳之賦歛，商循族世之所繫，工用高會之規矩。榮乎隱隱，各得其宗。在  
這種生活態度之下，社會變成了靜止狀態，而失去了前進的動力；尤其是在  
「農國先嚳之賦歛，商循族世之所繫，工用高會之規矩」，與荀子所說：「  
被用凡非器者擊毀」的原則之下，使改良生產工具，以增加生產力的可能  
性，完全消滅。

這種精神直到晚近，猶是經濟發展的一大障礙，例如鴉片戰爭以後，外  
人雖以堅船利炮打破了中國的關門，但是却打不破中國人的守舊精神，故五  
口條約通商，而洋貨的堆銷則異常遲滯，因為中國人他視洋貨的心理非常  
遲鈍，非常頑強，這便簽訂南京條約的威爾遜（Henry Pottinger）和英國的  
商人——尤其是開辦夏的棉紡織業商人——都大失所望。他們本以為開闢了  
中國的市場以後，則會有源源不斷的棉紡織工廠的出品，倘不足以供應中國一省的  
消費。但是五口通商以後，實際上所能銷售的英國棉紡織品的數量，實後不  
足道。連年之內，英國對中國的棉布輸出，不及其總輸出之百分之十，棉  
紡不及百分之三。棉紡時人的記憶：「洋紗初來之時，民間並不喜用，間  
有採用者，布莊收買後，銷路極滯，於是莊家必格外挑剔，不收洋紗之布，  
民間遂亦不敢以洋紗採用」，而織工的強烈反對，拒用外國原料，亦是一個  
重大原因，如當時有外人記載此事稱：「廣東的織工，舉行了真正的威脅，  
要求停止棉紗的輸入。他們的要求，就是棉紗輸入的增加，則察其妻子們  
將棉紗洗淨的利益。他們為給予其所提出的要以實力，會聲明如果在他們  
的織機上織到英國的棉紗，則馬上要焚毀」。這種情形直到光緒年間中國自  
行設場製造以後，依然存在，「其時布商收布，凡見採用洋紗者，必剔去不  
收」。於此便可見這種保守主義的勢力之強大，與影響之深遠了。

(五)

中國二千年來一個傳統的經濟政策，是重農抑末，末即工商業。重農與  
抑末，是一個問題的兩面，因為要重農，故對於工商業不得不採取極端的抑  
制政策。  
中國農本主義的思想，本淵源有古，而且在最初確定這個政策時，事實

上亦確有其必要。因為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立國的基础完全在農，自富國  
強兵以至於日常的養生送死，一切均須取給於農，故國語稱：「民之大者在  
農，上帝之靈靈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  
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教國純固於是乎成」；三國時和洽亦云：  
「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故廢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本」。重農不僅有  
經濟的理由，而且還有政治的理由，管子說：「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  
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  
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  
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養為國者必先富  
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  
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國富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又呂氏春秋上農  
篇稱：「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  
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  
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漢時韓非對於這個道理發揮得尤為透澈，  
他說：「民貧則盜賊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殖者，不地  
者則僻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盜之  
於衣，不待饑饉，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  
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慈母不能保其  
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趨飢救，廣畜積，  
以實倉庫，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農本主義的思想，大率不出此兩  
類，這便鑄成了古代重農政策的骨幹。

重農政策的另一面便是抑末，即極力壓制工商業。古人認為農與工商  
業不能並興。因為農業是生產的，工商業不僅不是生產的，而且是妨礙生產  
的。大家都以為商賈是「男不耕而食，女不織而衣，亡農夫之害，有奸陌之得」  
；而工則不外奇技文巧，即所謂雕文刻鏤，錦繡纂組等，古人認為這些東西  
都有害於農事：「雕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樂器  
則亂之本也，女工則末之原也，飢寒並至而能不為姦邪者，未之有也」。  
工商末業既都有害於農業生產，自不能不加以抑止。管子說：「末業不禁，不  
能妨礙生產，甚且可以動搖國本，管子說：「上不舒本，則末業不禁，末業不禁

則民能於時事處權利，餘地利，而求田野之賄，貪德之貨，不可也。呂氏春秋曰：「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國弱，其產約則輕選，輕選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賈誼傳曰：「生之有時而用之無節，則物力必屈；背本而趨末，食不若素，是天下之大劫也。」抑末政策的理論根據，大率類此。

抑商是在防止商業資本的過度膨脹，防止商人的自由活動，歷代政府曾以種種方法加以排壓困阻，使之不處於正軌，如秦漢之制，係「先發更有商工及農者買入，後以官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官有市籍者」；漢制買入不得衣錦繡綉，操兵騎馬乘車，並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賜給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官為吏。其後歷代帝王皆師行此意，如符堅定制金銀鑄幣，工商卑賤不得服之，犯者棄市；隋制工商不得仕進；唐制工商不得預於士伍，並禁止工商騎馬。降及近代，其制不改，如明洪武十四年，「令農民之家，許穿細紗細布，商賈之家，止穿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亦不許穿細紗」。而如此類的禁令，不勝枚舉。抑工則從禁文巧入手，管子說：「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不禁，則民乃淫」；荀子說：「論百工，……使雕琢文采不敢專造於家，工師之事也」；呂氏春秋三月紀稱：「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禮記王制主張得更徹底，凡「作異器奇技奇器以異衆，殺」。二千年來歷代朝廷爲了貫徹這種主張，常常在交際禮行，嚴禁工巧。

這種重農抑末的政策，自古代以至近世，一脈相承，形成了一種不可變的傳統，歷代政府皆奉爲金科玉律，絕少變更，不特空想的環境已不變更，而只是一味的在申論重農抑末的重要，不僅一體而論，即在隋唐這一套老調，而歷代帝王也照例而重農抑末，想這一套陳陳相因的說教，直到近代，無所變更。例如雍正二年九月上諭有云：「夫養民之道，惟在勸農務本，若奢舍本而末，爭取目前之利，不肯盡力勸助，殊非經常之道」。於此我們便可以知道重農抑末之根深蒂固而流行了。這與歐洲自重商主義時代以來，各國政府極力獎勵並扶持工商業的情形，造成反比。

政府新加以整頓，社會益益爲顯現，稍有聰明才智的人皆避之若浼，重農一舉，生產技術實無由改革，清末郵政總局於其所著極世危言中會論此弊，謂：「秦漢以後，佛老盛行，中國才智之人，皆歸於清淨虛無之學，其於工藝一事，簡陋因循，習焉不察也。夫則器術學，皆由山田川而用而厚民也。乃後世以工藝爲鄙，以農爲賤，以片務者視之，若輩亦自等庸奴，自安愚拙，無一聰明秀類之士，而心而相從者，無不乎器用，窮，物業凋敝，一見泰西之工藝，而自愧，疑若鬼神也。」總之，在政府極力妨礙，社會不加重視的情況之下，非僅工藝，而別無職業可營者，孰肯甘居下流？即使能够勉強經營，並且亦能獲其利，然在長期禁文巧抑商賈的政策之下，工商業尤其其亦只能維持原有的狀況，而不能逐漸改良其技術，日益擴大其規模。

(六)

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前提，是營業自由，因爲只有在自由放任的條件之下，企業家才能盡量發揮其營業的才能，所以資本主義的指導原則，必然是。Necessitate，這一點太史公也懂得，他說：「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用之，商而通之，此皆有以發其微期會，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之徵賈，貴之價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這與亞丹斯密在原富中所述的若合符節。如果根據傳統的禮法，習俗，或迷信等，對於經濟活動加以種種的干涉或限制，則經濟進步的動機便完全窒息。中國過去恰好正走了這一條路，歷代政府每每根據了各種傳統的觀念，對於人民的經濟生活，加以種種不必要的干涉及管制。

干涉管制的理由，有的係根據於傳統的禮法，有的係根據於一種神秘的迷信觀念，此外還有政治上的種種原因，如歷代對於冬兩經濟活動，採取嚴格的干涉政策。所謂傳統的禮俗，即宗法社會所遺留下的種種制度，如管子所謂：「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修生則有軒冕服使殺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棺食棺之度。雖有異身貴體，無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無其爵不敢用其財」，即係此意。漢書貨殖傳序亦謂：「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至於士，雖抱關擊柝者，其爵祿養官室車服棺槨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既不得



體實，夫然故上下序而民智定」。這都是說人民的衣食住行以及精神祭祀等日常生活，全有一定的禮法制度，上下大小，彼此不得逾越。其後典型的封建制度雖已消滅，而歷代帝王仍在努力保持這種禮法制度。並且管制的範圍，不僅限於人民的日常生活，而是遍及於一切經濟活動，例如對於工商業，便有種種硬性的規定，如禮記王制曾明定：「有非璧金璋不鬻於市，命服命車不鬻於市，宗廟之器不鬻於市，犧牲不鬻於市，戎器不鬻於市，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兵車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衣色亂正色不鬻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鬻於市，衣服飲食不鬻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鬻於市，木不中伐，不鬻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鬻於市」。這個政策為歷代政府所踵行，對於工商業每以此「王制」為根據，加以種種的干涉。例如魏書載：「舊制，民間所織絹布，皆闊廣二尺二寸，長四尺為一匹，六十尺為一端，令任服用，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高祖延興三年秋七月，更立嚴制，令一準前式，違者罪各有差，有司不檢察，與同罪」。又宋太平興國九年十月詔曰：「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斯古制也。頗聞民間所織絹布及他匹帛，多幅狹不中樣式，及絀疎輕弱，加染塗粉，以欺誑販賣，因而規利，宜令兩京諸州府，民所織匹帛，須及程式，買肆之未售者，限以百日，當盡言之，民敢違爾復織，違者，三分賞其一」。其他如禁採珠玉金銀，禁作文巧錦繡，禁為奇技奇器，乃至器尚方織造，焚天下機杼等等措施，已略述於前，茲不贅。

在各種干涉經濟行爲中，有許多是由於迷信，例如礦冶業便是一例。所謂迷信，是古人認為天地採礦，要發洩地中穢氣，穢氣一洩，不儘地脈枯竭，亦且上干天和，故每每以此種理由，禁止開礦。如西漢時曾會說：「今漢家鑄錢，及諸雜官，皆置吏徒卒，攻山取銅鐵，擊地數百丈，銷陰陽之精，地氣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此也」；東漢順帝永建四年二月戊戌，「詔以民人山鑿石，發洩穢氣，動有可慮，察用當禁絕，如建武永平故事」。二千年來因為怕發洩穢氣及破壞風水

之故，對於礦冶業總是採取一種干涉禁止政策，直到近代，此風未改。故遲清末年雖因財源匱乏，而不得不開放礦禁，然一般人猶格於風水之說，一遇官私有開採之舉，則動以傷殘龍脈為辭，輿情沸騰，環請封禁，足見積習相沿，破之匪易。中國過去就爲了這一類神秘的理由，阻礙了礦冶等重工業的正常發展。

其次歷代帝王爲了穩定政權，消弭反側起見，每干涉人民的經濟活動，例如禁止人民開礦，一半是由於迷信，一半是怕人民聚眾倡亂。這個道理桑弘羊說得最透澈，他說：「采鑛石鼓鑄貨鹽，一家聚眾，或至千餘人，大橫盡收放流人民也，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奸僞之業，遂朋黨之權，其輕爲非亦大矣」。歷代帝王遂都爲了這種政治的理由而嚴禁人民開礦，直到近代，其勢未改。如清雍正二年九月戊申，諭兩廣總督孔德瑄：據奏請於廣東開採，以濟窮民，聯發廷臣會議，知昔年粵省開礦，聚眾多人，以致盜賊漸起，鄰郡戒嚴，是以永行封閉。……且各省無賴之徒，望風而至，豈能辨其奸良，而去留之勢，必至衆聚難容。况礦砂乃天地自然之利，非人力種植可得，焉保其生生不息。今日有利，聚之甚易，他日利絕，則散之甚難，曷可不徹始終而計其利害耶？至於課稅，朕富有四海，何難於此？……若招商開礦，設官徵稅，傳聞遠近，以致衆聚難容，則斷不可行也」。這個傳統的干涉政策，直到太平天國起事以後，政府才因了財政困難而開放礦禁。

礦冶業的發展，尤其是貴金屬礦產開採的發展，對於資本主義的發展本有直接的影響，而中國則在這種不合理的傳統政策之下，困頓了兩千年之久。然而礦冶業之被禁止，不過干涉政策的一端，其他工商企業在政府的干涉阻撓之下，其困難顯連的情形亦大都類此。儘管在行政上推行這個政策時，其效率不一定過高，但是由這種政策所造成之精神壓力，則異常沉重。因爲傳統的，神祕的力量，在中國社會中本異常頑強，在一種貴因循重改的社會輿情之下，對於政府這種適應保守，適應迷信的政策，每每是推波助瀾，甚且變本加厲，成爲經濟發展的一個重大的阻力。

# 藝術教育的本意

豐子愷

「藝術的」三字，被人誤用為「漂亮的」，「華麗的」，「摩登的」的意。因此，「藝術教育」一名詞也會被人誤解，以為就是畫畫，唱歌等的教育。其實完全不然。「藝術的」不一定漂亮，華麗，或摩登。「藝術教育」也不單是教畫與唱歌。不漂亮，不華麗，不摩登的，很可以是一「藝術的」不會描畫，不會唱歌的，也很可以是飽受藝術教育的人，知道了藝術教育的本意，便相信此言之不謬。

真、善、美、是人性的三要件。三位一體，缺一不可。凡健全之人格，必具足此三要件。教育的最大目的，便是這三要件的平均具足的發展。因為真、善、美的教育，善是意志的教育，美是感情的教育。知識、意志、感情、三方面的教育平均具足，方能養成健全之人格。

教育的重心，可以專注在三者中的某一方面。專注在意志方面的，為道德教育，專注在知識方面的，為科學教育，專注在感情方面的，為藝術教育，以前引用過「一體為教，其用主和」的話。現在再用此法說明，即：道德教育之體為真美，其用主善，科學教育之體為善美，其用主真。藝術教育之體為真善，其用主美。

論道德教育是善的教育，科學教育是真的教育，藝術教育是美的教育。但這不過是就外形而言，不是絕對的。真善美好比一門鼎的三隻腳。我們安穩這個鼎的時候，那一隻腳放在外面，可以隨便。但是後面的其他兩隻腳，一隻也缺少不得。缺少一隻，鼎就擺不穩，譬如：道德教育倘絕對注重意志方面，其病為「任意」，任意的結果是「冷酷」。科學教育倘絕對注重知識方面，其病為「任知」，任知的結果是「冷淡」。藝術教育倘絕對注重感情方面，其病為「任情」，任情的結果是「放浪」。都是不健全的教育。歐化東漸之初，我國人盲法西洋，其病都變本加厲，「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的狀態，時有所見。研究科學回國的人，把人看得同機械一樣。研究藝

術回國的人，看見中國裏只有他一個人。美其名曰「浪漫」。所謂「象牙塔裏的藝術」，就是這班人造出來的。

故藝術教育雖可說是「美的教育」，但不可這藝術背後的真諦二條件。否則就變成「唯美的」，「唯美的」，「浪漫的」，「放浪的」，不是健全的你教育了。這道理可以用畫來說明：譬如畫一副肖像畫，必須顧到三個條件，第一，你要描寫的人必須是可敬愛的人。第二，你必須描得肖似逼真。第三，布置設色用筆必須美觀。第一條就是善，第二條就是真，第三條就是美。缺了一條，就不是良好的肖像畫。其結果諸君可推想之。

所以描一幅畫，看似小事，其實關係於根本的精神修養，我們不能單從圖畫上面着手藝術教育，必須根本從「感情」的教育着手。故藝術教育，又可說是一「情的教育」。情的教育的要旨，一方面在培植感情，使它發露，他方面又要約束感情，使他不越軌道。這就是一「節制」。禮弓裏有一段名文我大約記得如此：「曾子寢疾，病。樂童子春坐於床下，曾元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宛，大夫之賢歟？子春曰，止。童子曰，華而宛，大夫之賢歟？……曾子曰，然。我未之較易也，元起易發，曾元員，夫子之病亟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且，敬請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得正而斃於，斯已矣。樂投而易之，及席未安而沒。」這可謂得情之正，可為千古美談。藝術是情。愛親而至於姑息，便是一「任情」，便是一「放浪」，任情放浪的藝術，其實不是愛而是害。抗戰時代，可歌可泣之事甚多，此種諷刺亦甚易找。苗可秀的同志因多敬愛他，要陪着他一同殉國，他忽發狂，即不免「姑息」，「殉情」的批評，而不能稱為大愛。感情教育不健全，對人的愛亦不正大，故「愛的教育」，是意大利人亞米契斯的一冊名著。中國有夏丏尊先生的



譯本。然而這冊書中講的，不完全是這層意思，所以有「軟性教育」之辭，幾位中米契斯的朋友爲了這正他這一點，另著一冊較嚴的教育，發先生也有譯本。這書真正的書中偏重感情的教育，主張硬的教育。這兩冊書，在教育者是極其矛盾的。偏重愛的教育第一頁來，即可看到過於感情而近於感傷的書。秋季開學的時候，一位女先生換了一班主任。看見原來主任班裏的學生，因爲惜別，感傷得說不出話來，甚至幾乎下淚。又如少年雜誌中的敘利亞，夜裏偷偷地起來代父親傳書，弄得身體衰弱，學業荒廢，也是偏重感情而走入姑息與小愛的一例。這使我想起中國古代的二十四孝來。王祥臥冰得魚，吳猛恣蚊飽血，董廷珍埋兒，都孝得不成樣子，其過當比曾子更甚。這些事例，可說是極情，極善，而先却了真理，但中國人著書，往往不重事，而注重事實所表現的一頁思想，或事實所象徵的一種真理。故其事實往往過分誇大而不可信。愛的教育者，頗有中國著者的風度。故這種書極有缺點，終不失爲偏激感情的一種手段。

美的教育，情的教育，愛的教育，皆以兩邊感情爲要義。故藝術教育必須選擇最遠於兩邊感情的東西來當作手段，最遠於兩邊感情的，是美色和美聲。換言之，就是圖畫科和音樂科。這些美色之中，真善美俱足，情理之中，多樣統一，最能給人一種暗示，不知不覺之間，把我的感情潛移默化，便趨於健全。所以健全的美術教育不僅注重描寫技巧，而必須注重其在生活上的活用，譬如兒童無故在白色的粉牆上亂塗，在美觀的雪地上小便，這等都是鬧畫弄塗的教育的健全之故。不然，兒童應有愛美心，不忍無端破壞世間一切美態。有的兒童，無故毀壞自然，無故殘殺生命，以破壞爲樂，最好「不該做的」。譬如無端毀壞一個花瓶，推廣此心，便可濫用權勢來任意破壞別人的事業。譬如隨意一筆塗鴉，推廣此心，便可濫用權勢而到市面炫耀。所謂隨意塗鴉之類，即在於此，人在世間行事，理當受感情的控制。故表面看來無理行爲，暗中是同情制宜。「以力服人者，貌恭而不心服」，便是情在那裏作怪，其情之教育，在無形中，比其他教育有力得多，藝術教育的重要即在於此。

## 未來的武器

張文知

- 一、坦克車由「水陸兩用」變爲「海陸空三用」，上面裝有射擊式的翅膀，前面多了個螺旋槳；當飛到陷所，地雷區等障礙物時，就放出翅膀，將發動機和螺旋槳間的接合器拉攏，就能立刻升空。
- 二、遠射程砲的砲彈以每秒十萬公尺以上的初速從砲口飛出，穿入同溫層後，還能再走好幾個鐘頭；然後落下。砲的最遠射程，能繞地球一圈以上。
- 三、曲進式的高射砲彈，在無線電操縱器的操縱之下，能夠轉抹測角地追蹤敵機，但是並不一定能命中敵機，因爲那時的飛機，已經普遍地備有「隱身裝置」了。
- 四、飛機出發作戰的時候，機師的駕駛員只須伏在隱蔽地帶，對着地圖忙忙碌碌地撥弄着刻度盤上的許多指針；乘在飛機裏的全是些受無線電操縱的「機器人」。
- 五、魚雷也能因無線電的操縱而能追蹤敵艦了，但是被擊擊中的敵艦即並不多，因爲那時即使最大的主力艦，也能和現在的潛水艇一樣在水中潛航了。
- 六、那時的「空中堡壘」有現在紐約城的十分之一那麼大，能夠垂直升降，發動時能在空中停留，除飛機上應有的各種設備以外，還帶有許多個機關槍等飛機共千餘架。
- 七、海軍工廠裏不再出品燃燒彈了，焚燒敵方建築的任務，改由一塊巨大的高透鏡去卸負。在晴朗的天氣，一架時製的飛機帶着飛到敵人後方去，所經過的地方，大部建築物都在極高溫的「焦點」下焚毀了。
- 八、步兵衝鋒的時候，除了帶着應有的兵器以外，還多了兩件新傢伙：一件是「隱身器」，使自身不被敵人發現；另一種是「現形器」，(未來式的照像鏡)用以去發現隱身着的敵人。
- 九、前面裝有「鑽地器」的「鑽地炸彈」的威力很大，能夠鑽進地下室或山洞裏去爆炸。那時的高級指揮部和重要機關，大部設在巨型的潛水艇裏，在水中常常移動，行蹤秘密，才可減少危險性。

# 人海滄

桑 (上)

朱 俠

十年游學，五陵結客，所交人物，無慮千數。雅堂廟之上，不乏棟梁之材；然以余所親，真才碩學，多道山林，俠客奇士，每隨房約。偶一回憶，或幽明路隔，或浮沉異勢。其間滄桑變幻，不無可紀之事。因錄為一編，以紀鴻爪。

## 一 太炎先生

革命以還，國學大師碩果僅存者，既推餘杭章太炎先生。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余隨先君至蘇州國學講習會講學，一聞先生於錦帆路寓處。時陰雨連綿，春寒料峭，先生御玄色狐皮長袍，款客於其藏書室中。四壁圖書，一窗風雨。先生別無寒暄語，惟一談及學藝，則證今博古，滔滔不絕；其記憶力之強，令後輩為之驚異不止。時余治中國經濟史，以籌餉於何時，衆說紛紛，疑莫能決，請益於先生。先生謂周官九府圖法，實為後世假設之辭，且九府圖法中，如玉府可會司書，並與泉幣無關。惟周禮稱周景王始鑄大錢，始可認為已有泉法之確證。其治學態度之謹嚴如是。

先君為太炎先生高弟，此次來蘇講學，承湯太夫人款待，即歸於其廬。是夕先君詢先生幼年事蹟，並其參加革命史實，先生慨然道之，余為筆記如左。

余「太炎先生自稱一十一二歲，外祖朱左卿（名有泉海鹽人）授余讀經，偶講蘇氏東華錄會經案，外祖謂夷夏之防，同於君臣之義。余問前人有談此義否？外祖曰：王船山顧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為甚，謂歷代亡國無足輕重，惟南宋之亡，則衣冠文物亦與之俱亡。

余曰：明亡於清，反不如亡於李闖。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論；若果李闖得明天下，則雖不善，其子孫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論身。余之革命思想，即伏根於此。依外祖之言觀之，可見革命思想，原在漢族人心中，惟隱而不顯耳。

十九二十歲時，得明季稗史十七種，排滿思想始盛。

乙未（清光緒二十一年）康有為設強學會，余時年二十八歲。先是二十五歲，始居杭州，肄業話經精舍，俞曲園先生為山長，余始專治左氏傳。至其開康設會，寄會費銀十六元入會。丙申（清光緒二十二年）二十九歲，梁啟超設時務報社於上海，遣葉浩吾至杭州，來請入社。問何以知余；曰因君前有入強學會之事。丁酉（清光緒二十三年）三十歲，因閱西報，知倫敦使館有捕孫逸仙事。因問梁啟超，孫逸仙何如人？梁云：此人志打倒滿洲。余心甚壯之。戊戌（清光緒二十四年）三十一歲，康梁事敗，長江一帶通緝多人，余名亦在其內。乃避地臺灣。

己亥（清光緒二十五年）三十二歲，自台灣渡日本。時梁啟超設清議報於橫濱，余於梁座上始得見孫中山，由梁介紹也。越二三月余回上海。庚子（清光緒二十六年）三十三歲，因唐才常主張一面排滿，一面勤王，既不承認滿清政府，又稱擁戴光緒皇帝，余甚非之。因宣言脫社，割離與絕。但後唐案通緝書上，仍有余名。辛丑（清光緒二十七年）三十四歲，在蘇州東吳大學任教員，以避其鋒。其年親履嘗於蘇州。

冬恩銘（後為徐錫麟所殺）為江蘇巡撫，問教士汝校有章某否，此人因講革命，故須問之。余時因年假回杭州，教士急遣使杭州通知。壬寅（清光緒二十八年）三十五歲，春即至上報，轉至日本，與秦力山交。時中山之名已盛，其寓處在橫濱，余擊常自東京至橫濱；中山亦常由橫濱至東京，互相往來，革命之機漸熟。余與秦力山張鴻泉等開亡國紀念會於東京。中山請余至橫濱與中會同志七十餘人宴集，每人敬余酒一杯，凡飲七十餘杯而不覺醉。其年又回國。

癸卯（清光緒二十九年）三十六歲，蔡子民等在上海設愛國學社，而張鴻泉鄒壽丹自日本歸。章行嚴自南京來，相見甚歡，皆與余結為兄弟。時。壽丹作革命軍，余為序而刻之。余又作致康有為書，痛斥保皇之非。行嚴又主蘇報社，亦發揮革命。康有為書中有一較活小陳不辨菽麥之語，於是清兩江總督派員來查，遂成大獄。余與鄒壽丹被捕，余在巡捕房與中山書，會稱之為總統，鴻泉為余送去，遂下獄三年。

甲辰（清光緒三十年）三十七歲，在獄中。

乙巳（清光緒三十一年）三十八歲，壽丹死於獄中。

丙午（清光緒三十二年）三十九歲，夏，余監禁期滿中山自東京遣使來迎，赴赴東京，入同盟會，主民報社。

先君以丙午秋至日本留學早稻田大學，丁未（清光緒三十三年）始與黃季剛、錢玄同、馬幼漁、周濂才（即魯迅）、許季嚴等，受業於章先生，常至

中。



# 爲學與做人

朱經農

今天我和大家來研討三個問題：第一個是爲什麼要讀書？第二個是爲什麼學校有科目？第三個是爲什麼受過教育的與沒有受過教育的有什麼不同？我記得，我小時問過我的先生，先生便教我念一首詩：「白馬紫金鞍，騎出外人看，問是誰家子？讀書人做官。」由這首詩看來，讀書的目的，是以要讀書的人看；是讀書的人看？不是的。又有人說：「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那麼，讀書看來，讀書爲的是可以找個漂亮的愛人，可以發財，是的嗎？也不是的。這都是中國人過去的錯誤觀念。然則這個問題究竟要如何解答才對呢？有人說：教育是訓練我們適應環境；有人說：教育是幫助我們繼續生長；有人說：教育是培養我們改造社會的能力。還有許多別的法，這些說法，都對，但有一更簡單明確的答案，便是教育的目的，是教你們怎樣做人。所以一種教育如果僅教你們各種技能或科學，而忘却教你們如何做人，這種教育是無用的，是可痛心的，這便叫做「本末末的教育」。做人的要件是什麼？且略舉數點說一下：

一、自強不息的精神：易經上面說過：「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就是說我們要時時努力前進，永遠努力前進，天天用功，天天求進步，吃一日飯，做一日事，日積月累起來，在學問方面，而成大學問家，在修養方面，即成偉大的人格。大如果一日進步停止，即等於死，人如果只吃飯不做事，即成爲「衣架子」；一個人如果活六十歲，但在三十歲便停止了進步，那個人便活了六十歲，却等於三十歲死，不過到六十歲才埋埋罷了。

二、創造的精神：我們知道人類必須能創造，才有不斷的進步，中國古代是富有創造力的，如發明火藥，指南針，造紙，印刷等等均是創舉很早。但是後來的人，因步自封，墨守陳法，不事改進，並且做工者不讀書，讀書者不做工，以致中國之科學及工商業落於人後，引起國際的侵略，你們看痛心不痛心？我們要知道，雙手萬能，手腦合作，做工者要讀書，讀書者也要做工；不但人人要求改進，並且要進而爲發明家，創造新事物，創造新精神創造新世界。

三、大公無我的精神：我們要知道人是一種社會動物，社會生活的，每一個人不能離社會而獨存，社會好，個人才得安全，社會不好，個人無論如何也不能得到安全的；有國家，始能得到保護，個人自由平等，脫離奴隸生活；所以我們人生在社會上，要能夠犧牲小我以成全大我，互助合作，以

若是有句云：「醉人老去留鴻爪，將士歸來駐馬蹄。」幼年爲文，已驚其長者；及長遊學東瀛，專治文藝，寫爲報章，流傳海內。片人目爲左派作家，若染亦不予置辯也。

余初若輩，乃一九三〇年春，時會將書送客，信譽若輩，若輩贈詩云：

我來柏林城，君涉漢口浦，送君歸國，揮手良深惜，歸來須市中，滿貯新紀效。

相厚復何辭，日夕共焚香，風雨無間阻，紙筆劇難談，意氣添眉宇，羅縵與幻台。

况與笑人仇。

當時常相道從者，有戲堂君復理，從吾猶士登，君擢獨至，季海徐梵澄，忠實陳康，以及梁宗岱，劉衍淮等，皆一時知名之士。每逢星期假日，觀聚會於柏林西郊森林湖畔余之寓處，上下古今，縱橫六合，無所不談。真有一意橫飛動，篇終接混茫之感。而席間拍尺八極，才氣橫者，尤以若輩爲最。後余以一九三二年夏歸國，若輩亦不久東渡。其在歐遊時極廣，曾西遊巴黎，南訪羅馬，研至探求古蹟，結交名士，又以所學爲藝術史，故對於文藝復興時代之名城——如冷拿（Florence）威尼斯（Venic）梵羅（Verona）米蘭（Milan）——尤三致意焉。

若輩歸國以後，任行政院參事，余則任中央大學經濟系主任，公餘譯暇，仍時相過從。然若輩個性，豪放不羈，固不宜於久處幕僚。抗戰軍興輾轉西遷，若輩由湘入黔，小駐沅江，曾有詩云：「十年低首欲辭華，惟將干將待莫邪，今日荒江驚亂曉，撫膺惟有淚辭麻。」蓋其內心生活之苦悶，不禁自然流露於文如聞也。

雖然，在南京時期，亦有一事值得紀念者：若





學人  
小傳

# 記愛因斯坦

宋荔萍

愛因斯坦是一八七九年五月十四日生於符騰堡之烏爾穆。他父親是一個經營化學品生意的人，所以從小他便是在一種科學的空氣裏。他出世不久之後，父親便在慕尼黑開了一間店，但是直到現今，他已有六十六歲了，而且世界聞名。他對於慕尼黑這個城一直沒有一點好感。他是在這年初次入學，也是在這里初次讀得了一個猶太人在德國是怎樣的痛苦。他當時年紀太小，也太孤單，不能反抗，而同時他是一個神經敏銳的孩子，不能忍受同學那種惡劣的談話侮辱。

十五歲的時候，他父親往義大利做生意，他便往瑞士的阿爾斯，在這裏他覺得自由多了。愛因斯坦在這間私立學校裏，沒有什麼聲望，但是他好像拉馬克一樣，總是過着孤單的生活，不像巴士特，達爾文都有很親密的朋友。他運用他那偉大的想像力，好像世界上就只有他一個人。

愛因斯坦做學生時沒有任何不同常人的才能，相反的，他在某些動作上顯示拙笨，舉止遲鈍，態度羞澀，連話也不周全，無論上校回家，他總是走在後頭，不如一羣學生的活躍活潑，甚至於有時好像好惡，學校的教師當他是沒有出息的學生，即他的父母也很爲他擔憂，說他太笨。將來或許不能在社會上立足。他本人也覺得他不是英俊的青年。中學畢業後因對數學有特長之處，就在沙夫豪森充任教學教授。

他教書的工作不很順利，第二學便入了瑞士籍，在百倫担任一個審查員。在這裏的收稅官朋斯也是和愛因斯坦相差不多的人，很靈敏的工作，細心察看各種新發明，以至於有什麼權利的侵犯。這種工作只爲生計，工餘的時候，他便在利利克大學讀書。終於得到了博士學位。此外在專利局任事時，他認識了一位斯拉夫族的姑娘，這位姑娘是對數學有興味的，他便娶了她，因爲兩個人之間沒有共同的瞭解，不久終於離婚。

他在利利克寫了許多文章，使人讀了覺得他是一位有學問有想像力的科學家。在這些早期的文章中，有一篇很引起大家注意的便是對於布拉克文所

發見的現象，給了一個解答。

一九〇五年他在專利局時，發表了他的「相對論」。他這理論是由於非于洛和羅倫茲的方程式而推論出來的。這是一種很不容易捉摸的方程式。經過愛因斯坦的天才顯明出來。由此科學界便對他注意起來，結果利利克去學請他去担任理論物理學的特任教授。這是一九〇九年的事。兩年後布拉克大學請他爲教授，一年後利利克又把他要回來，一直到希特拉把他請走的時候。

柏林的凱撒威廉學會，請他去担任會長，并被請爲普魯士皇家科學會的會員。這時他的收入可以使他把他全部的時間都集中在研究的工作上。兩年後，他發表了他的「相對論」。於是舉世驚駭了。

讓我們翻過了人類史冊，像愛因斯坦的「平地一聲雷」著名於世界，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最使我們值得驚異的，以一個「數學教授」地位，竟能爲全世界報章刊物的重要資料而他自己呢尚不知道，他答覆訪問記者的問話說：「成名」得連他自己也「莫明其妙！」

愛因斯坦說空間是曲線的分子在空中活動是沿着一種連續不斷的曲線。這曲線有說明沒有？偶一看時，似乎不合理，但愛因斯坦是有事實的根據。

向來相信牛頓萬有引力的，對於水星的行動却無法解釋。水星不依照軌道而行，不是從何處起，便仍在何處止。水星總是每次要多繞一些路才完成一次整的繞行。牛頓的理論不能解釋這種軌外的行動，愛因斯坦却能很準確的解釋。

關於光前進所走的路線的問題。從前的思想，以爲光不是物質的分子所組成的，所以在真空裏會沿直線而行，不管什麼引力。牛頓的信徒們以爲光經過與日相近的地方，便會變爲曲線，好像光是物質組成的一樣。但是照愛因斯坦的理論，却以爲這種光線會比牛頓的定律要彎曲兩倍。這一點便是使一般物理學家和天文家感到不安的地方。幸而這種理論不久就得到證明。



# 評朱著經濟學綱要

夏炎德

朱伯康著 青年文庫之一 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

在戰時荒蕪嚴重的今日，作爲大學一年各院共同必修的經濟學一科，在教學上都感困難。教者悉心講解，學者雖一時領會，但過後容易遺忘，筆記難於完備。採用原文書本，不但供應不敷，書價昂貴，且以戰時學生之程度恐難能完全讀懂。國人自編教本現在市場流通而可供大學生用的也極少。三十二年十二月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的朱伯康先生所著「經濟學綱要」一書，頗能適應此種需要，朱先生係留德經濟學者，對於此學研究有素，屢與討論各種問題，都能洞悉要領，且常有獨到的見解。回國以後，在國內著名大學主授經濟學，教學經驗殊爲豐富。此書乃就著者在浙江大學之講稿修訂而成，都三一二面，計十數萬言，內容簡單扼要，而於經濟學上應論到的題材大體都已論到，而且條理井然，文字洗鍊，適合大學或專科學校之用。經試探爲教本或參考書，結果頗爲圓滿，因再公刊推薦於讀書界。

本書著者，受德國經濟學之陶冶甚深，重視國民經濟之發展，對於時下一般經濟學書所忽視之生產力，非常注重。題材大多取自彼地現代學者(Adolf Weber, Max Weber與Alfred Weber)諸家。但涉文獻甚廣，對英美各家的重要學說亦未忽略。著者對於各家主張決不無條件接受，而能加以判別取捨，並處處以適合於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爲指歸，實自成一完整之體系。

卷首有著者長序，提出了經濟學上的幾點精義。他首先找出經濟學的根源是哲學與歷史，要從整個的宇宙觀與世界觀裏去理解，要從各國歷史的基礎上去理解。支配經濟學的因素很多，但歸根總不外這兩點，著者可說抓到了要點。因時爲著者對於哲學與歷史都有甚深的修養，故說來能感覺親切。其次他指出經濟學當以人爲本體，「資本應爲經濟爲服務，經濟應爲國民而服務。」在這以物役人的資本主義社會上，此點實有道德的必要。此外他說現在的經濟學不替其名詞如何，實際都是國民經濟學；人間的經濟關係相互聯繫，彼此依存個體全體重於個人之義，力圖個人自利之不當，這些都是有價值的意見。第一編論基本概念時，沒有討論到方法的問題，是很出乎我意外的，因爲德國人最講究經濟學方法，不過著者在實際解釋時所用的方法與一貫的觀點，還是非常顯明。第二章論國民經濟發展之條件爲一般實業所不論，頗有參考的價值。

第二編討論生產，將勞動列於各生產要素之首，頗獲我心。第七章將生產組織稱爲「生產要素之關係」，用字頗爲恰當；惟所論過於簡單，對於近代生產的集中化，聯業或獨佔企業，以及政府統制，國營事業等均未提到，希望以後再版時能補入。

世界大戰結束，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各國的法官在巴黎判定德國罪狀時，英國許多科學家往非洲和巴西去拍照一個日蝕的照片，看愛因斯坦的理論究竟是否是對的，照片的結果證明他的理論全對無誤。

愛因斯坦的性情很古怪，沒有一件事可使他過分的喜愛或憎惡，對於名譽富貴或豪華，他都看得極輕淡，有一次，大西洋上某輪船上的船長，爲了優待愛因斯坦，特地讓出全船最精美的房間等候他，誰知到竟被他拒絕，情願睡在最下等的艙裏！德國當局爲了表示對愛因斯坦的厚愛和尊敬，趁着他五十誕辰的祝會，特的爲他在普斯丹城建造一座半身銅像，還贈送他一所精緻的住宅，和一艘小遊艇。

不過愛因斯坦留德最後幾年，命運遭透了，他自己亡命國外，有好些時他住在比利時，他的財產被充公，他的家門上了鎖，還有一位警察每夜睡在他的床邊；因爲他是猶太人啊！當他受美國紐約普魯頓大學之聘前往講學時，他爲了避免新聞記者的訪問麻煩，預先吩咐他的朋友在船未到埠以前，先行中途秘密乘小船抵岸坐汽車疾步入校。

在目前，解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學說的書籍，至少已出版兩千冊以上，但據愛因斯坦自己說，現世界真正了解他的「相對論」的，却只有十二個，連他自己在內。

愛因斯坦曾用這極簡單的例子解釋「相對論」。

一。你坐在一位美麗的姑娘旁邊一小時，你好像覺得只有一分鐘的短暫；但你坐在火爐旁一分鐘，你又覺得像有一小時的長久了！這就是相對性。

二。愛因斯坦研究時，自己把自己鎖在小樓上，直等工作完畢，他才令他的妻子開門，有一次，他的

本報的交換論是最完備的一篇，對於價值與價格的理論，一般目為重要而費解的部分，解得非淺。特別是價格論，於競爭價格與價格關係，能不用曲線圖解而說得極清楚。就實際言，價格很少是完全競爭或完全獨占的，故於新近英美方面所提出的不完全競爭與獨占競爭一節，希望以後也能補入。讀者對於價值與價格理論之外，對於貨幣、信用與銀行、交易等實問題，都有適當的敘述，可使初學者得到全豹。至於加納公認則無言論之處，本報討論工資，利息與地租，若能用之關係尤能詳他書之所略。

第五編消費與儲蓄的簡單，書寫簡潔、效用、需求與性與生活水準諸點，或則全未論及，或則語焉不詳，似宜再加補充。最近與亞述一書，擴充材料後，可成一書，或以之列於交換論中，較為適當。至於經濟生活之將來，亦乃為這題目有較複雜的環境而作，在經濟學之著作中可有可無，即略去之於全書價值亦無所損。此係個人私見，一得之愚，尚祈朱先生指教！

於全書而論，本書雖是一部有價值的著作。其中心思想在發展國民經濟之理論。中國方在着手經濟建設的時期，此種更切實得珍貴。若若者得此：一國民經濟學不該以本國為中心思想。其中中心思想目的，應為國家之利益與國民全體之幸福。例如，工業在我國並不發達，工業品之需用，若向人購買，必比自製更為便宜與健康，在經濟原則上說，我對不應工業化，此一時不合經濟原則，但合有利。但是，我們不能如此，我們不能不建設自己生產，並設法工業化，此一不合經濟原則，但合國民經濟原則。故經濟原則在發展國民經濟，國民經濟適合上言，要受國家的最高思想的限制的，研究經濟與政策時，此種不能不考慮。可見原書其(一〇)這一章中一段。若對於建設獨立自主的國民經濟具有幫助，在書中處處可以看到。這種愛國的精神，也是青年讀者所應學習的！

### 偶然的發明

振之

是一九〇六年，地帶正在研究着新的樹膠質。為了他家庭的嗜好吃甘蔗，不捉老鼠，因此他的實驗室裏藏了許多甘蔗，這得他不能安心工作。在一九〇六年，他偶然在研究新的樹膠質。為了他家庭的嗜好吃甘蔗，不捉老鼠，因此他的實驗室裏藏了許多甘蔗，這得他不能安心工作。在一九〇六年，他偶然在研究新的樹膠質。為了他家庭的嗜好吃甘蔗，不捉老鼠，因此他的實驗室裏藏了許多甘蔗，這得他不能安心工作。

他偶然在研究新的樹膠質。為了他家庭的嗜好吃甘蔗，不捉老鼠，因此他的實驗室裏藏了許多甘蔗，這得他不能安心工作。在一九〇六年，他偶然在研究新的樹膠質。為了他家庭的嗜好吃甘蔗，不捉老鼠，因此他的實驗室裏藏了許多甘蔗，這得他不能安心工作。

他偶然在研究新的樹膠質。為了他家庭的嗜好吃甘蔗，不捉老鼠，因此他的實驗室裏藏了許多甘蔗，這得他不能安心工作。在一九〇六年，他偶然在研究新的樹膠質。為了他家庭的嗜好吃甘蔗，不捉老鼠，因此他的實驗室裏藏了許多甘蔗，這得他不能安心工作。

他偶然在研究新的樹膠質。為了他家庭的嗜好吃甘蔗，不捉老鼠，因此他的實驗室裏藏了許多甘蔗，這得他不能安心工作。在一九〇六年，他偶然在研究新的樹膠質。為了他家庭的嗜好吃甘蔗，不捉老鼠，因此他的實驗室裏藏了許多甘蔗，這得他不能安心工作。

本報登記證內政部警字第七四八四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第一類新聞紙類  
每冊定價國幣壹元